

思想者杂语

野

菊

二

集



马斗全 著

南窗寄傲

青 岛 出 版 社

野菊集

守夜者札记

林贤治著

青山遮不住

雷英著

带伤的黎明

崔月平著

西窗东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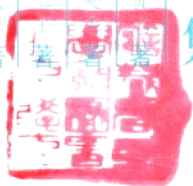
程映虹著

凝望夕阳

邢小群著

南窗寄傲

马牛金著



1996.6.15

野菊

马斗全·南窗寄傲·序言

自序

一点交代

参加工作以来，多从事古文献研究，凌乱写了不少文字，其中有多篇还发表于全国性的专业学术杂志，但出论文集尚是没影儿的事。这一方面是论文集没有读者，另一方面是自己也没多大兴趣。余事作诗人，虽学诗较晚，但在诗词界也算小有名气，在诗友鼓动下，曾自选数百首拟出一册，却因出版社将诗题中人名全部删掉而甚感别扭，清样至今尚放书架顶层，不欲出了。散文随笔之类，属余事之余事，如今却要结集出版，不但文友们，就连自己，也觉着有些意外。

因此，也应依惯例写一小序，略作交代。

前年夏天，我终于拥有一台电脑。有了电脑，加上友人的怂恿，于是就写了几篇散文，不想一发而不可收拾，两年来散文随笔及读书札记之类竟写了大小近百篇。这须特别感谢南北许多热心而负责的报刊编辑，是他们促使我一篇接一篇写下去的。那些应深深感谢的编辑的名字，已多得不好在这里开列了。

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主观原因，也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心中一种难解的情结，也可以说是胸中之块垒。前几年，有诗友招饮，微醉而成诗一首，中间两联为：“年来酒量因贫减，老去情怀与

野菊

马斗全·南窗寄傲·序言

道亲；文运转衰休问价，诗心难改但忧民。”这两联其实可以作为我近年来心境的写照。经济潮的冲击，腐败风的泛滥，都使自己不能不更加关注现实，去思考一些问题，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和以后。堂皇言之，这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社会前途的关心，其实不过是自找烦恼，所以曾有“心力抛残无所获，书城坐久每多忧”之句。虽然有时自己也觉得可笑，但积习难改，闲来仍爱冥思遐想，有时甚至想得很苦，无端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因此有许多话想讲出来，也就有了这些文字。

每坐到斗室南窗下，便不由得想到陶渊明的“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本人当然没有陶处士那令人羡慕的傲岸情怀，不过一俗人而已。但因不通人情世故，有话总好直说，且多不合时宜，所以每受亲友嗔怪。俗人而又任性不群，诚人生一悲。因名本书曰《南窗寄傲》。

本书所收，多系文化思想方面的文字。虽多不合时宜语，但因了祖先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应某些编辑朋友的建议，所以文中尽量少些激烈，多些平和。所选除少数几篇为前几年偶尔所作外，皆拷贝于电脑中。少数几则学术性短文，是因与某些篇中有些话相关，就收了进来，好使读者明白底里。如今将这类文字结集出版，对读者是否真有点儿益处，尚难料，唯愿不要因我胸中块垒而影响了读者朋友的好心情。

马斗全

1998年7月于井门



马斗全·南窗寄傲

目 录

- [1] 不该想到的话题
- [4] “没有办法”说署名
- [7] 愧对傅山先生
- [9] 我看今日文化界

- [13] 另一种浮躁
- [16] 为学术严肃性一哭
- [19] 批评与规则
- [21] 批评的悲哀
- [23] 学习一点古人的批评精神
- [25] 我的批评文字
- [28] 徐迟的老境
- [30] 假如……
- [32] 老学者的藏书
- [34] 作家应爱惜自己的名字
- [36] 关于稿酬的感慨
- [38] 出人意料的败诉
- [41] 想起李鸿章吃狗肉的事

- [43] 闲话张之洞的要人读书
- [45] 读书人的自省
- [47] 诗与书画脱节现象堪忧
- [49] 何必褻渎诗神
- [52] 传统诗词与当代社会发展
- [59] 此风堪忧
- [61] 说影视作品中常见的一种错误
- [63] “新榜样”与“旧书生”
- [71] 万里桥边女校书
- [78] 不为人知的大家
- [82] 不能读书时的读书
- [87] “结实的书”
- [89] 说“误读”

- [92] 说读书时的被“蒙骗”
- [95] 令人困惑的书名
- [97] 闲话名家稿件
- [99] 有人求购书
- [101] 也谈治古典文学与新文学之难易
- [103] 武威铜奔马
- [105] 闲话寒食与介山
- [107] 说骆宾王诗中之“漳滨”
- [109] 关于“修禊事”
- [111] 多泪的李汝伦
- [113] 令人高兴的朋友
- [116] 我那“字友”
- [118] 听叶嘉莹先生谈诗

- [122] 心声的交响
- [126] 关于毛泽东诗词的一封信
- [128] 大家的诗
- [131] 陈寅恪先生的清华情
- [134] 如何对得起陈寅恪先生和读者？
- [138] 谈陈寅恪 1945 年秋的几首诗
- [142] 陈寅恪先生抗战胜利时的忧虑
- [145] 是谁首先为武则天翻案
- [148] 诗，便应如此
- [151] 诗人的散文
- [155] 人间需要好杂文
- [158] 思考的产物
- [161] 一本没有书名的书

[164] 长想武威

[174] 寻找蒲州城

[181] 家住黄河边

[185] 和沙地先生同行

[187] 旅途小记

[189] 姑射山中清廉洞

[192] 我们村的武侯祠

[194] 名桥万里几人知

[196] 天井关前寻天井

[198] 冬上羊肠坂

不该想到的话题

不知为什么，近来我每每想到裴多菲那首著名诗篇的开头那句：“生命诚可贵。”并且只是想到这第一句，对于后面的三句，却没有去想。这倒不是我不看重爱情和自由，而是近来总是不由得想到死的话题。

年轻轻的，却竟经常想到死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身体时好时坏，有时总有一种支持不住了的感觉。有位陈大姐，每次见面总是要我注意身体，好些友人也总是经常问到我的健康。今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病，当时只是感觉不行了，想挣扎着起来给在外地的爱人打个电话，作个告别，也没能打。事后虽然觉着好笑，但当时确是心中充满了悲哀。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不断有英年早逝的坏消息传来。路遥去世，我震惊之余，倍感悲哀，曾有小诗一首：

英年早逝各行同，谁为神州哭此风。

我劝天公略睁眼，留将几个使成翁！

看来老天也无力佑护这些可怜的人，如今又传来了朱维红在南京病逝的消息。英年早逝，竟也挨到了我的同学！

朱维红也是一位作家，我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她的死，在我

心中引起很大震动。她是受同学们尊敬的大姐，毕业后去了南京，大家彼此很少见面。1992年夏季，我们在母校聚会过一次，外地有不少同学也赶来参加，朱维红因为孩子高考没能来。聚会后的第二天我即动身去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经过南京时，去看她，给她带去作为聚会纪念的文化衫，上面有到会同学们的签名。她非常高兴，看着一个个签名，向我询问了许多同学的情况，说远在南京，非常想念同学们，聚会没能到，万分遗憾。下次聚会，一定要来的，见见久违的同学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同学之情仍是真的。从当时的谈话中可以听出，她分明感到人生的艰难。她不知听谁说我曾晕倒在办公室，大病过一场，分别时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万不可掉以轻心。可是没想到随后她却竟无声地走了！

当突然听到朱维红逝世的消息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惊愕之后，接着便是眼泪夺眶而出。我知道，她是累死的。事业和家庭的担子，对人到中年的她来说，都实在太重了。还有如今件件都难办的事，已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她偏又是一个不肯向命运屈服的女性，干工作还像当年在大学学习那样认真，那样卖力。除了备课讲课、补外语作论文外，还业余从事小说创作，而且成绩颇丰。就在逝世前不久，她给另一位同学的信中曾说到，又有十来个短篇和中篇近期要发表。我真不理解，她要我珍重，而自己为什么却是那样不要命。我和泪悼她的一首诗，中间两联为：“但恨天高成永诀，更伤君去正中年！关情嘱我多珍摄，弄笔缘何不自怜？”这是直写自己心中的悲愤与感慨。

朱维红在病重期间，没有告诉任何同学，她大概以为自己能好的，谁料竟永远离开了亲人和同学们，离开了这个对她不公平的世界。以致在她弥留之际，我们不但没能有人去看她，而且连电话也没通过。朱维红逝世后，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大概是笔太沉重了，所以至今还没有动笔。前些天还有同学问我有没有写一点关于朱维红的文字，我说要写的，只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比较累，

等身体好一点感情平稳后再写吧。

我近来确实比较累，就说今晚吧，身体感觉不好，不但怕写东西，连书也不想看，只是想早点睡。有一位戴老先生刚才来电话，说他的诗文集近将付梓，想明天上午送来，要我近几天帮他看一看，作些修改。我这几天事情正多，还不知能不能办了，哪能看一本诗文集。也不怕老先生见怪，只好回绝了，说过几天再说吧。刚上床，电话铃又响了，快十一点钟了谁还打电话来。起来去接，是在北京读博士的冀满红同学打来的，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热情和高兴，劈头就告我：“老俞去世了！”

“什么！”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这是真的！

俞瑚，也是我们班同学，北京人，当年插队到山西，毕业后才回到北京。他是九三学社社员，也是一位品行很好事业心极强的人。毕业后一直没见过面，只是听说他工作干得很好，前几年已被提拔负责某方面的工作。孩子正上学，爱人有病，可是，他突然也走了。

我擦干了眼泪，又回到床上，自然是怎么也难以入睡。

我的这两位在中年的时候便走了的同学，都是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的。他俩同岁，均生于1947年，属“老三届”。大学毕业时，他们已三十大几了。这个年龄，对于想在世上做点事情的人来说，是毕业得太晚了。“文革”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恐怕损失最惨重了，我们损失的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被断送的青春和机遇自然是找不回来了，而这些人又大都不愿庸碌无为，因此也就只好拼命地干。由此又造成了许多人的悲剧。手边正好有张报纸，说抽样调查表明，发病率最高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发病率最高的是中年知识分子。我想，中年知识分子中发病率最高的便是“老三届”了。

越想越累，还是什么也别想了，早点入睡吧。但愿明天早晨起来，能觉着身体好一点。

(1996年8月)

“没有办法”说署名

诗友刘伯伦先生，在千里之外的县城工作，平时难得一见，这次上省城开会，抽空来看我。但到寒舍后，却不知他是来看我，还是来看我的书，有沙发不坐，总站在书架前一边闲聊一边翻书。翻看中，他发现了问题：某书不但已经出版了，而且他撰写的长文竟被随便加署了一个名字！我对此书有所了解，告他说，不但早已出版了，而且稿费和样书也至少三年前已发了。他说曾向有关人询问过多次，得到的答复总是尚未出版，还一直以为此书黄了。

刘先生甚愤然，显得有些激动，说有一种被捉弄、被欺负的感觉。我们的话题，也就转到了署名问题上。

在现今文化界，署名问题已成为一个颇令人头痛或者说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本人在一家学术期刊编辑部工作，便时常碰到一些教人哭笑不得的事。于是就一边品茶，一边将一些颇可感慨的事告诉刘先生，让他“长点见识”。

前不久某大学一教师寄来一稿，审后以为不错，决定刊发而通知作者时，作者说署名要加一个名字。这显然是替别人署名，这样的事已屡见不鲜。文章发排后，作者又来电话告说，加署之名要更换。细问其故，原来那两人是夫妻。我甚不以为然，问他，你的论文为什么要署上别人的名字，而且加来改去的。作者说，没有办法，此人是校科研处副处长，提出来要署名，不答应不行。原先说为他妻子署名，现在又要改署他自己的名字。

还有本市一位作者，来编辑部送稿件时很为难地悄悄提出，希望不要透露此稿是现在送来的，最好能按一个多月前的来稿登记。原来他的上司要在他的论文上署名，他说稿子已经送交编辑部了，为的是那位领导为了顾全面子，可能不再要署名。虽则这样，还是不行，后来文章刊出时，他那领导的大名还是署了上去。看来这位作者也是没有办法。

便是我本人，也数因署名而不快。

前曾为某书撰写了一些文章，孰料书出版后，我所撰的文章中，有的竟莫名其妙地署作了别人名。找责任编辑查问，答复说她也不知道其中原因。我问所署之名究系何人，答云他们出版社的。想是书稿在出版社稽延期间，出版社什么人擅自将我的名字改作了别人之名。请责任编辑追查，不但迄无回音，而且那些文章的稿费也至今未追回。

最令人气恼的是一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署名之事。该书工作量极大，是我和一同事主要承担，还有部分同志先后协同参与，费了三年时间才完成的。因为项目经费是单位分拨的，所以两位领导便挂名为“主编”（若不让其挂名，则该项目无法进行）。因此影响了有些参与者的情绪和责任心，致使此书错误较多。最后出书时，两位领导还不满足于只是挂名当主编，竟在《前言》开头加上全书由他们“审定”的话。我发现后予以抵制，说大到书名以及框架、体例，小到一字词、标点，都是我们自己商量、斟酌而定的，你们未整理或改动一字，当“主编”已经违反著作权法了，怎么还好要“审定”之名？因我坚决反对，最后还是从清样中删去了背着我所加他们“审定”之类的话，并按我的要求注明各人所负责的部分。即使这样，在出版过程中，一领导还是通过出版社或印刷厂在整理者中偷偷加上了他女儿的名字。书出版后我才发现。

刘先生对此甚表惊讶，眼睛瞪得老大老大，说真是想不到。他身处太行山里的小县城，只知埋头搞他的地方志研究，自然“山里

不知山外事”，所以感叹说，如今有些人怎么竟成了这样子！那读者所看到的署名，还有多少真实性？又说书生就应该有书生气，要讲究认真，并称赞我在“审定”问题上不畏权势，坚持正义，有文人骨气。

我告诉他，几年前我院评职称时，规定专职科研人员晋升正高职称的标准为，成果字数三十万，其中须有两篇发表于国家级报刊。我编辑工作之外，成果字数近五十万，发表于国家级专业学术杂志之文达十篇。不但远远超过了所要求的标准，而且在申报者中无疑属突出者，省职改办曾明确表示我可占本单位指标而破格晋升。但当时一些远未达到标准者也得晋升，我却与正高职称无缘，并且一搁置就是好几年。不但1993年10月以来工资待遇大受影响，而且将影响到永远。然后对他说：这就是“正义”和“骨气”的代价！

听了我的话，没想到过于认真从不信邪的刘伯伦先生，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真是没有办法……”

（1997年3月）

愧对傅山先生

又有文友来函问：兄等是怎么搞的，竟将《傅山全书》错作《传山全书》，令人大不解。每接此类询问或见责信，真教人不知说什么好。而每想到《傅山全书》书名之错，就更令人不知说什么好。人们形容心里不舒服时每说像吃了苍蝇，其实吃了苍蝇哪有我这般难受。

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傅山全书》，由本人与一同事主要承担。傅山著述颇丰，整理出版《傅山全书》，为学术界一件大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曾作重点报道。此项工作不是一般意义的点校工作，而是搜集、整理、新编傅山全集，难度较大，只搜集、辨认手稿便颇费周折。本人摒除一切事务全力投入，在其他一些参加者的配合下，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算是为祖国文化事业做了一件事。而出版时书名被弄错，实在出人意料，令人万分遗憾。

傅山为太原人，《全书》完成后，我提出书名请省书协主席徐文达先生题写，一则徐先生为著名书法家，再则徐先生为省博物馆馆长，对此书十分支持，在我们搜集傅山手稿时曾给予许多便利。商定后我去见徐先生，徐先生也欣然答应，精心书写了两张交我，我们选定一张设计于封面，交出版社出版。但是出版后的书，未用徐先生题签，而改用另一人所题写的书名，可惜依照隶书字帖书写时照错了字，将傅山的“傅”字写作“传”字（繁体），封面和书脊就都成